

出川見聞

(續)

樂恕人

抗戰採訪錄第一章

三巴路上八陣圖

我們乘坐的民權巨型江輪，從重慶開出以後，一路上經過長壽、涪陵、酆都、忠縣、而達川東第一大城市萬縣。涪陵一帶，以出產聞名全球的榨菜而商業興隆。這地區的長江在秋潦退後，兩岸沙灘綿互幾百里，榨菜所用的一種青菜頭，就種在兩岸沙灘上，沙中礦物質豐富，再加以四川氣候，冬季並不太冷，因之青菜頭肥美鮮嫩無比。收穫後以青菜頭略為曬乾，拌以鹽、酒、辣椒末及香料等，用泥土封置瓦罈中，歷時二三月即成榨菜。外國人只知中國榨菜；外省人又只知四川榨菜；但四川人却只重涪陵榨菜，唯有涪陵出產的榨菜，才最道地，最肥美。

從重慶早上八時開船，下午五時左右即到萬縣，停泊江中，不再前行；因為萬縣過去即是三峽，入晚不能航行，要等第二天一早開船，傍晚駛過三峽，停泊宜昌。李太白最有名的詩句：『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

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』就是指的這一段航程。

沿途江流還不太曲折，兩岸多是起伏的邱陵，航行非常平穩。民生公司的服務人員，連船上的茶房都規定要初中畢業，稱為『侍應生』。他們全穿着民生紡織廠的黑白灰三色棉紗織成的『三峽布』的制服，態度和藹親切，服務非常週到。在統艙中進三餐，因為地方狹小，臨時小桌擺上兩葷兩素的四菜一湯，盛飯全由侍應生服務。因為八個客人圍坐一小桌，在統艙中起坐不便，因此旅客就樂得舒服享受了。

到萬縣因為時間還早，船上有侍應生陪伴客人上岸入城遊覽。萬縣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楊森的防區，頗有建設。馬路、公園、電燈、醫院、圖書館，應有盡有，是四川頗為現代化的第一等縣治。特別是西山公園建設不凡，並擁有江山一覽之勝，更成為遊人必去之所。

民國十五年九月五日，英國軍艦曾在此大逞驕威，開砲轟城，造成九五慘案，第二十軍的部

隊，組織敢死隊划小船猛撲江中的英國兵船，可謂雖敗猶榮，也曾給英國人一點厲害的顏色看看。

次晨民權輪繼續東駛，過雲陽奉節二縣，就開始進入三峽的瞿塘峽，最有名，最壯麗的風景，從夔門前一段航程開始。四川人普通叫出川為『出夔門』。夔門之前，有名勝灘預堆，八陣圖、白帝城等處。白帝城就是蜀漢劉備駕崩的地方，經過時，風蕭蕭，水蕩蕩，不由得要想起三國時代的史實來了。

這一帶的江山，風光壯麗奇絕；古蹟名勝，層出不窮，非常吸引後之來者。我們從萬縣凌晨啓碇，一直憑欄眺望，經過上述的名勝時，不禁發生濃厚的思古幽情；也想起了唐宋以來，許多大詩人過此時所留下來的名句。不妨選錄一部有關詩文，供中外雜誌讀者欣賞。

先說『八陣圖』：據宋人樂史（可能是作者的先祖輩。）所撰『寰宇記』載稱：『夔州奉節縣，本漢魚腹縣，八陣圖在縣西南七里。聚細石

爲之，各高五尺，廣十圍，凡六十四聚。」此地是蜀漢諸葛丞相操演兵法時所建：唐代大詩人杜甫就有過一首題名：『八陣圖』的五言絕句道：『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！』

這首詩表現了杜老夫子憑弔八陣圖，想到劉先帝違背了諸葛亮的政略：『東連孫權，北拒曹操。』親自統率大軍，爲關羽失了荊州，被俘而死去復仇的失策。使千載以下的人，過八陣圖而吟杜老的詩時，頗添無限的興亡感慨。

清代大詩人王漁洋有『晚登夔府東城樓望八陣圖』七言律詩道

『永安宮殿莽榛蕪，炎漢存亡六尺孤。城上風雲猶護蜀，江間波浪失吞吳。魚龍夜偃三巴路，蛇鳥秋懸八陣圖。搔首桓公憑弔處，猿聲落日滿夔巫。』

可見人同此心，王漁洋亦如杜老，爲蜀漢興亡而長嘆了。

灩澦堆測三峽水位

其次提到『灩澦堆』，又名『淫澦堆』，亦名『猶豫堆』。

三國時代桑欽所撰『水經注』載稱：『白帝城西江中有孤石，爲淫澦石，多出水二十餘尺，夏則沒。』又據唐李肇所撰『唐國史補』上說：『蜀之三峽，最號峻急，四月五月尤險。故行者歌之曰：『灩澦大如牛，瞿唐不可留。灩澦大如馬，瞿唐不可下。』』

杜老就有以『灩澦堆』爲題的五言律詩：

『巨石水中央，江寒出水長。沉牛答雲雨，如馬戒舟航。天意存傾覆，神功接混茫。干戈連解纜，行止憶垂堂。』

從這些詩文上，可以看出古來航行三峽，就以灩澦堆的出水高低，來探測三峽中的水位，求得航行的情況。

輪船快要駛進『夔門』時，在左前方的江岸上，就聳着類似唐王之煥所寫涼州詞的名句『一片孤城萬仞山』的風景，那就是名傳千古的『白帝城』，蜀漢劉先帝在伐吳慘敗退回四川後，到此就一病不起；臨危對着從成都趕去的諸葛丞相託孤，歷史上很有名氣。

杜老夫子出川打算回官兵收復後的老家河南前，就在蘇州一帶住了很久。他會有過許多精采的詩篇，描寫這一帶的風光，和他對國家治亂興衰的感慨。其中就有好幾首是關於白帝城的，在此不能多寫。其他歷代大詩人沿江出川的，也有不少名作。我們舉目眺望，白帝城遺址，少年心中，也有無限愴然之情。

過了白帝城，夔門的赤紅色的岩石，壁立千仞。上面綠樹葱蘢，下面江流有聲。蔚成一幅奇絕的雄偉的如畫的山勝水！

南宋大詩人陸游是從江蘇溯流入川的，他的詩集中有不少描寫沿江風景史實的名作。他的『入蜀記』一書，記載自江南到夔州的江上旅行，對於這一帶的山川風土，敘述得非常雅潔，同時對於考訂古蹟，更有許多寶貴的論述，當代後世，傳爲名著。

他有一首古詩，題名『入瞿塘登白帝廟』，

正好方向是和李白、杜甫、蘇軾、王漁洋各大詩人出川相反。且看他的吟歎：

『曉入大谿谷，是爲瞿唐門。長江從蜀來，風景奇麗，全國馳名世傳『四天下』爲：

夔門天下雄、

巫峽天下奇、

劍閣天下險、

峽嶺天下秀。

抗戰以後，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先生入川以後，游了灌縣的青城，他品評爲：『青城天下幽』。如此一來，川蜀風景就變成『五天下』了。

這都是中華民族的錦繡河山，屬於全民族的，而不是屬於四川一省的。我握筆記述了如此之多，乃是爲中華江山而謳歌，絕非爲川蜀一隅而贊頌。

將近一千華里的三峽——從瞿塘峽到巫峽，再到西陵峽——我們不肯躺在艙內，儘情在甲板上游連，欣賞這天下的奇景。輪上有專人解說沿途峯壑名勝，使人歷歷在目。峽中常常呈現出陸放翁名詩句的風景，正如他所吟：『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』江流迂迴曲折，有的地方波平如鏡，有的地方湍流駭浪。這一段航程，船頭上的領江和副領江最爲辛苦；領江目不轉睛，看清水路，用手指比出左右參差。大副就照着他的指點手勢，轉運舵盤。全船的生命財產就寄託在他們二人的合作上，不然就有小之攔淺，大之觸礁沉船的危險。

過完瞿唐峽，中段到了巫峽，峽中的巫山十

三峽，牛肝馬肺峽，黃牛峽等等，令人想起李白、杜甫、白樂天、蘇東坡、陸游、王漁洋、范成大和許多大詩人的詩詞；特別是船過神女峯，你更會想起戰國時代大詞人宋玉的名作高唐、神女兩篇詞賦。

宜昌漢口赤壁孤山

過完三峽後段的西陵峽，出了平善壩，輪船到湖北宜昌，當晚在江邊一宿，第三日即航抵漢口。宜昌夜市未去欣賞，輪船旁划來了十幾艘船上酒家，用鐵鈎竿子搭在輪船旁邊，招引旅客下到木船去進酒食，却也別有風情。

從宜昌開船，長江江面忽然開朗，回顧三峽盡處，就如南宋大詩人范成大（石湖居士）辭去四川帥任，沿大江回蘇州老家在荊州舟中的詩：『千峯萬峯巴峽裏，不信心間有平地。渚宮回望水連天，却疑平地元無山。……』

四川湖北兩省境內，三國時代的史跡最多。船過江陵時，人們會想起三國的蜀吳兩國，在荊州的爭奪戰爭，以及後來關羽在荊州的失敗，被俘被殺；又會想起劉備為關二弟復仇討伐吳國，被吳國青年將領陸遜大敗，敗回白帝城一病不起的史事。

再前行，快要到漢口的嘉魚縣境內，江邊有赤壁，就是孫權和劉備合作大勝曹操八十三萬大軍的古戰場。我們的大詩人蘇東坡官貶湖北黃州的前後赤壁賦。我想蘇東坡是借故發揮，他不會錯認黃州赤壁就是火燒曹兵的『三國周郎赤壁』吧？

吧？

第三天晚我們船抵漢口，停泊幾小時上下貨物，我們曾上岸去遊覽市區；可惜時間來不及去對岸遊武昌，登名勝黃鶴樓，欣賞唐代大詩人崔顥所吟千古名作：『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』那首詩的風情。

漢口一帶，來往各國的巨輪，特別多的是英國和日本的商輪和軍艦，那時期，我們對日本太陽旗特別憎恨。『九一八』以後，中國人最仇視的帝國主義者，無疑地是日本了。

漢口以下，江面遼闊，水深無阻，所以輪船夜間也照樣行駛。船到湖北江西交界處不遠就看見九江岸上的廬山，江邊綠柳成蔭，廬山青翠，白鷺亂飛，風景秀美極了。

再過長江中名勝大小孤山，快到南京前，船經過采石磯，人們會懷念着在那兒墜江溺斃的詩仙李太白；也會懷念起南宋名臣四川出生的虞允文，曾經在那兒大敗金兵，穩定了南宋幾十年的天下。

南京下關碼頭到了，那已是從重慶出發的第五天下午。果然首都氣象不凡，江面上停滿了輪船，大大小小，中國外國，商船軍艦……

可是，我們又觸目驚心起來，飄揚着旭日紅輝旗的軍艦商船，多得令人驚奇，令人憤恨！！

從下關碼頭到南京城區，還有一段路程。抗戰前的首都，似乎沒有隨時可乘的計程汽車，主要的交通工具，除了公共汽車外，就要算馬車了。

我們戀戀不捨民權輪，在依依的情緒中，握

別了船上的朋友，他們在次日還得續航上海走完渝滬全程。

雇了一輛馬車，三個青年帶着簡單的行囊，開始踏上首都的土地，一路上的的蹣跚，從下關市區進入南京臨江馬路上的儀鳳門，在那時期，我們初次由內地到首都，沿途飽覽山川形勝，早已眼花繚亂，心情壯闊起來；及到走進南京，更覺得首都果然氣象萬千，馬路寬闊平坦，建築物高聳雄偉；說不出的振奮，歡欣。

南京這個古都，誠如諸葛亮所說：『鍾阜龍蟠，石城虎踞，真帝王之宅。』當你從江邊上岸起，眼望着那浩蕩奔騰的長江，江岸遠在天際，真如李白的詩：『唯見長江天際流。』又如杜甫的詩：『不盡長江滾滾來。』世界上偉大的江流的詩：『在我一生中所見，唯有長江最具氣魄。長江傍，在我一生中，唯有長江最具氣魄。長江傍，在南京東去，江邊不遠處即是雄峙着的紫金山。南京城背鍾阜，臨大江，形勢偉大極了。所以古來即成爲建都聖地之一。從三國時的吳國、經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的『六朝』，再到南唐，明初；它歷經興亡盛衰；有過金陵、建康、建業、白下、白門、應天等名稱。到明成祖遷都北京後，才改稱爲南京；直到民國十八年，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又建都在此。

抗戰前的首都氣象

進南京城後，首先經過城區最大的交通幹線中山北路，兩旁有鐵道部，交通部等中西合璧的宮殿式建築；馬路正中是柏油大道，道旁是種植法國梧桐的花圃，圃旁是碎石的小道，道旁才是

人行道和店舖。這條大馬路經過鼓樓到新街口，再轉折東去，由中山東路一直通到中山門，出城門去即是明孝陵和中山陵陵園區域。新街口四周是銀行區，有好幾幢羅馬式壁柱的洋樓建築。中山東路經過繁華的太平路口，成了丁字形。太平路南去才是南京城的舊面目，中華門一帶的繁華鬧市。中山東路最不平凡，舉凡政府的政軍機構，多集中在這條道上，有國民政府、行政院、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等等。其他如中央醫院、中央飯店、勵志社總社，和世界上也少有的市內飛行場的明故宮機場，也全在這條大道兩旁。

南京城區之大，世界聞名，計在城牆以內的地區，如果連城郊算入，面積竟有四百六十五方公里。可是國民政府奠都後，內憂外患，不斷迫脅，從民國十八年到抗戰前的民國二十五年，國都的建設，成績並不顯著。城區內一片片的農地、池塘、田地、菜圃、不像一個都市。以如此之大的國家，如此人多的民族，而他的國都當年人口才不過一百萬上下。

而且交通還不頂發達便利，現代都市所具備的重要條件，也不完美。最糟糕的要算南京的下水道。那年月，一遇大雨滂沱，南京城內許多地方就成澤國；自然，一般人更沒有抽水廁所的衛生設備；至於如今普遍享受的冷暖房，當年僅有少數機關備有暖氣管設施而已。

我們不過是學生，只能找一家比較價廉的旅舍住下，就在中山北路橫街小巷裏，寄居位於鼓樓側面的一家學生旅館；後來又搬到中山東路小巷叫鄧府巷的大中華旅舍。

抵京當晚，就被四川老同學許某的母親，請我們在新街口附近的名川菜館洗花晚餐，算是給我們接風洗塵。夏季的浣花川菜館，闢有屋頂花園，我們一面進食，一面眺望南京城的夜景，只見四圍霓虹燈變化閃爍，是生平第一次所看到的奇觀，極為欣賞驚嘆。

住定後，在南京求學的同鄉學友除中央大學等文學校外，最多是陸軍軍校十期和十一期的學生，他們星期放假外出，多來伴陪遊玩。南京的名勝如中山陵園、玄武湖、秦淮河、北極閣、鷄鳴寺、莫愁湖、燕子磯、采石磯等處，無不有我們的遊踪旅跡。

南京在我們到達的當年，國家憂患重重，華北局勢因日本軍閥的着着進逼而日趨緊迫，陝北的圍剿殘兵軍事尚未完成，各省的軍閥，有的依然對中央表面服從，實際上各自為政；有的甚至在公開反對後，勉強合作。因之，中央政府須得應付內憂外患，不能集中力量建設國家。

但是，我們平心而論，當年的國民政府實際上仍然是奮發有為的。在那樣內外艱險的時局下，一面剿共，一面應付日本帝國主義，一面安撫各省軍閥，再在其他各方面從事建國工作。諸如修築東南鐵道公路，和西北的公路；改革幣制，以求穩定財政；擴展經濟建設，以求國力充實，寬裕民生；建立各種專門性質的軍事學校，發展海空軍及特種兵種等等要政。各項準備，在基本上是為了建國，但在急切需要上則是為了對付日本的侵略。因為照當年國際情勢，特別是日本軍閥的侵華政策，和國內的民心輿情；對日抗戰，

以挽救國家民族的命運，已經不可避免，只是時間或早或遲罷了。

因此我們在南京所見的現象，特別是星期日，街頭上全是武裝同志，城內城外各軍事學校的學生。除了陸軍軍官學校以外，砲兵學校、工兵學校、高射砲兵學校、教導總隊等等。滿城是身着草黃草綠色軍服的學生軍，他們所穿的翻牛皮軍鞋，走在中山路上，一個個雄糾糾，氣昂昂，鏗鏘着響，正代表着民族向前進的時代步伐。

至於空軍軍官學校，却設立在杭州的寬橋。海軍除原有的福建馬尾海軍小學外，又在江陰設立了海軍電雷學校，等於海軍軍官學校。因此，在南京不常見，也不多见海空軍學校學生。

在平時，街頭上最多的是營造廠的卡車，飛駛奔馳。各處的建設，公營私營，忙碌異常。可以說，南京在那時期充分表現出勵精圖治，奮發有為的現象和精神。

記得那年國慶節，南京的慶祝氣氛可以說空前隆重熱烈。

那次國慶，政府舉辦了全國童子軍紫金山大露營。來自全國各省市的童軍代表隊，總共有一萬名之多。

一週間的露營節，高潮就是參加國慶節的提燈大遊行。

當天，南京各學校機構放假慶祝，從早到晚，所有名勝風景區，所有娛樂飲食場所，無不市利三倍，整天整夜座無虛席。

入晚，提燈大遊行開始，我們也是新街口廣場四周成千成萬的觀衆的一部。

民衆團體，軍校代表的提燈過去了，然後是全國各地的童軍隊。遊行隊伍從下關方面來，經中山北路、東路、太平路到中華門去，走遍首都的精華區域。

童軍提燈隊特別受到觀衆的鼓掌歡迎。

突然，到了東北三省的代表經過時，羣衆不僅鼓掌，而且高呼，悲壯熱烈地大叫着：

『收復東北！』

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』

『中華民國萬歲！』

東北童軍的燈火彩牌上的口號，和羣衆壯烈的驚天動地的呼聲，完全一致。童軍隊的代表流淚了！羣衆叫得流淚了！我和同伴們也叫得流淚了！

彭家珍在我家住過

名記者趙敏恒先生，於抗戰末期在重慶出版一本書，名叫『採訪十五年』，敘述他在美求學從業的經過，一開場他就說：『人們一生，職業的選擇，常常是偶然的。』

但我選擇新聞工作，則決非偶然。

說起時，『四十年來話倍長』；但是，回想起往事，却有簡單敘述的必要和興趣。

我們四川樂家，原是在明末張獻忠之亂後，從江西吉安府（今廬陵縣）移民去的。本以販賣四川藥材爲生，後來即定居成都府雙流縣。先世爲農，到了先君太常公才以功名致士，在清末做了直隸省清河縣知縣；後以政績不錯，再升調山西省并陘縣。并陘是肥缺，每逢新縣太爺上任，

煤礦商業照例送『見面禮』十萬兩紋銀，其中七萬兩歸道臺大人等分用，三萬兩由縣太爺等收用。先君去後，斷然拒收，把煤商代表召集訓斥一頓，原封退還，要從此革除這種陋習。誰知如此一來，得罪了道臺，認爲先君斷了他財路，不多久藉故革了先君的職務。

那時，革命運動風起雲湧，先君暫往天津租界住下，準備回原籍退休。不料四川籍革命黨人便前往遊說，勸先君參加革命。先君對滿清還有少許愚忠，以爲食過君祿，不能造反；祇允在金錢上支助革命黨人，並且在租界上住家中設置客房，秘密接待川籍黨人來往食宿。這時，我的老大哥才十來歲，少年氣盛，就跟隨黨人活動，利用少年身份，不引起人注意，就開始偷運手槍炸藥等。

在我家的川籍黨人住客中，出了一位了不起的烈士，就是後來到北京，炸死滿清第一良將能臣良弼的金堂人彭家珍。他以身殉的結果，不啻爲革命黨消滅清廷大軍數十萬，民國成立後因功追贈大將軍。

革命成功，民國建立後，先君有斷絃之痛，就攜帶兒女乘船扶柩沿海溯江回到四川成都。先君續絃，再聚我的母親張蕙如，生我和妹妹共四人。我十歲時，先君棄養；所以我得庭訓於先君者少，幸虧有慈母教養，才得好好就學爲人。因此，我那幾位前母的兄長，大我十幾二十歲，當我還在稚小時，老大哥已經在北京辦過報，後來又回川從事政治活動；另外幾位哥哥，也分別在南北憲兵軍校及黃埔軍校卒業工作了。

民國十八年秋，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龔都南京後的次年；我以一個初上十三歲的少年，考進成都聯合中學的初中肄業。那時期，中學的平均學齡，比現在要大得太多。高中，甚至初中的同學，有少數竟是已婚的青年。四川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，當年流行早婚，許多還沒有成年的男女，早就作了父母。我們中學校自然也不例外，少數學生時常有太太帶着子女來會聚。成都在那時沒有男女同學的中學校，我考進初中二三年後，才有建國中學，成都公學等中學舉辦男女同校。

我在中學，和另外僅有的幾位同學，年紀最輕，常常被年紀大的同學們開玩笑，有一個小同學被叫作『公兒』，我則被叫爲『Little』，因爲我們不但年紀屬於最小的一級，而且個子也屬於小的一羣。

成都聯中是全川最有名的學校，校址是漢代文翁入蜀教學的遺址，因之我們校門有一扁額，上書『文翁石室』四個大字；而且有兩三年還改名爲『石室中學』。後來又改稱爲『成屬聯立中學校』。原來在清朝，成都府管轄下，有成都平原上十六個縣治，本校就是由十六縣出資創辦的，最前身即是清末民初的『成都府立中學』。

聯合中學既有悠久歷史，又有優良傳統，所以從民國以來，學生滿全川，聲譽傳省外。學校歷任校長，都是知名的教育家，而教員也是省會中的錚錚佼佼。並且，有少數教員，特別是文史方面的先生，竟是前成都大學，後來合併成爲『國立四川大學』的教授。如像教國文的林山畚

，教說文解字的趙少涵，教歷史的祝岐懷，教英文的宋誠之，好幾位先生，他們全是川大的教授，也是川中馳名的學者。

我們學校文史課程最嚴，算學次，國、英、算是主要科，考試特別着重學生這三科的成績，作為升級或留級的區別。

談起我那幾位哥

初中三年畢業後，成績優良的可以升入本校高中，成績平平則還要經過考試。最初時期，高中還分成文科和理科；到民國二十一年，教育部改制，規定全國高中將文理科廢除，一律改習普通科。如此一來，我在民國二十二年升上高中時，已經接受普通科教育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普通科絕對不如分文理科盡情合理。比如我本來對文史課程最有興趣，但所有大部功課和自修時間，全被迫去弄傷腦筋的物理、化學、微積分、大代數、解析幾何等習題，只有極少時間去攻讀文史。費力勞神，又不如意，當年教育部的這項『德政』，我可以說是千千萬萬受害者之一。

我們中學有一完善的圖書館，其中藏書頗多，而且還有少數當年中國和外國第一流的報紙和刊物。國內的第一流報刊：報紙如像南京的中央日報、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、北平的晨報、天津的大公報；刊物如像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和小說月刊、天津的國聞週報等等；都有平郵寄來的，陳列供師生參閱。

圖書館門首兩旁，另設報架，懸掛成都出版的報紙。

我進初中以後，不論國家和世界，正是多事的時代；尤其是國家剛好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建立，接着便遭遇黨內的分裂，寧漢政府對立。以後又緊隨着清黨，剿共。內憂不斷，外患又來，民國二十年又發生了『九一八事變』，日本帝國主義強佔了東北等等。所以因為時局緊張動亂，報紙就成為中學生每天必搶着看的課外活動。

這一時期，使我對於報紙有了另眼相看的感覺，在我心田中開始播下一粒種子，認為報紙和人生關係是太密切了！

正巧，進初中的第二年春天，我的四個兄長，在成都創辦了『平民日報』。社長的名義是我七哥『自尤』，經理是四哥『俊傑』，總編輯是五哥『蘊精』，而幕後的指揮調度，甚至寫發刊詞和大部社論的，則是我大哥『愛人』。

三個兄長，唯有大哥是老報人，他在民國十年後北洋政府時代，在北京辦過報。他當年用的筆名『愛人』，是根據孔子所說：『君子學道則愛人』的意思，不是普通所叫的愛人。後來就用自己的別號，並且就以之應世，不用本名本字。四哥是外行，畢業於北京憲兵軍官學校。五哥是黃埔軍校二期學生，參加東征之役負傷後退伍的。至於七哥，留學北平民國大學，在北平住了九年，書並未讀好，只是學得余叔岩親自指點過的平劇，回成都成為余派名票，轟動錦官城。

論文筆，『四五七』三位哥子差大哥不知多少倍。我這位老大哥在未進成都法政學堂之前，曾經目不窺圖者三年之久，熟讀二十四史；又曾

拜受蓉城名師課業，所以他的詩文造詣，遠非其他幾位兄長所能及，而且在十幾歲時，就被家鄉父老評為才子。後來在北平辦報批評北洋軍閥被查封，又回到成都來創業。他的同志好友，結為金蘭之交的，有名報人前新民報社長陳銘德，和重慶新蜀報總經理周欽嶽等。

報要人稱讚妻要自己誇

平民日報出版以後，不但編排新穎，而且社論犀利，成都同業側目而視，軍閥們更不高興，辦了不到兩年，就被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擅自封閉，老哥們在成都不能立腳，於是暫避重慶。因為那時期四川軍閥割據，重慶是二十一軍軍長劉湘的防區，劉文輝奈何不得。

在這一年多，每逢星期六星期學校放假，我們住校生可以外出住宿；我於是常到報館去看看玩玩。如此一來，我對辦報是怎樣一回事，便增加了解，而且發生濃厚的興趣。

尤其是晚間的編輯部，燈火輝煌，工作緊張，看他們說說笑笑，桌上滿是編輯人員的三寶——剪刀、漿糊、紅墨筆——實在有趣。

於是，我漸漸對學海軍，做艦長，當海軍司令的志趣有了轉變，十九已想辦報，做新聞記者。我當時認為，新聞工作既是那樣有趣，同時對國家社會關係又那麼密切重要，且不是既可報國，又可樂業的一條人生大略？

後來在民國二十三年，天津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先生入川遊覽，並前去我們學校參觀，對我們發表演說，強調新聞事業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性

使我更對這一行加深了認識。同時，我已在中學五年，學識認識和老哥們辦平民日報時期已大不相同，大有進步。我讀大公報，對張先生的言論早已折服；既睹他的豐采之後，更覺得成爲名報人的榮譽和力量，實在令人崇拜。以張先生爲例，連國家最高級領袖們對他也敬服，樂於爲友。他的言論又爲國內外所重視，在四川到處受到尊

重與歡迎。因此，我要辦報的志向更加堅定，心目中就以大公報、張季鸞作爲偶像。並且還要效法張先生的樂業精神，發誓永不做官，終身從事新聞工作。高中畢業前，我已決定到南京去投考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的新聞學系。我們在高中時，同學們互相談論升學，對於設有新聞學系的大學，只知在北平有燕京，在上海有復旦，在南京

則有政校。研究結果認爲燕京是教會學校太洋氣，復旦又在十里洋場的上海，唯有政校在各方面比較最適合。

高中畢業，參加全川會考及格，我就擬訂了一付似對聯又非對聯的座右銘，立了志願如下：

「辦一家別人認爲是最好的報紙！」

聚一位自己認爲是最好的老婆！」（待續）

杭州、曲江獲救之秘

周念行

一戴雨農先生二三事

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，日軍在金山衛的全公亭登陸之後，上海戰事急轉直下，跟着嘉興撤退了，沒過幾天，別動隊在杭州市內劃分了地區，貼上了符號，準備了火油木材等放火材料，決定焦土抗戰。那時浙江省政府主席係朱騷先（家驩）先生，他認爲一個地方不得已而失守了，這個地方上的人民和財產還是我們中國的，我們終有回來的一天，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，受損害的還是自己的人民。而且毀杭州未必真能阻敵，而留杭州亦未必遂至資敵。於是他便立刻用省主席兼全省保安總司令的命令嚴予制止。

到了十一月底，中央忽改組浙江省政府，以黃紹竑繼任主席，黃自山西經武漢九江南昌而來，沿途收容自京滬撤退之廣西軍隊三千餘人，循

浙鐵路入浙，他到達杭州接任之後，朱先生離去，他忽萌歹念，舊事重提，要火燒杭州，並擴大到南星橋開口一帶，以遂其趁火打劫之私圖。那時浙江省政府大部份員工已撤至金華，杭州市警察局長趙龍文同志尚留在杭州，得知這個消息，便急報戴雨農笠先生，戴先生認爲黃某這一舉，損害杭人與國家命脈太大，立刻用十萬火急電告 蔣委員長，委員長接電，立即電令黃某制止。抗戰勝利後，杭州南星橋一帶，尚有鱗次栉比的樓房可以看到，朱先生之功，固不可沒。戴先生之業績亦足多焉。

其次，民國二十八年冬，日寇三路進犯粵省，臨時省會及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所之曲江，形勢險惡，日便衣隊已竄抵曲江僅數十里之土坑口，代司令長官張發奎，粵省主席李漢魂，

擬向樂昌撤退，並將唯一與鐵路聯系之曲江大橋破壞。當時民心惶惶，認大橋破壞爲曲江不保之前奏。戴雨農先生適於此時蒞臨曲江，極力阻止破壞大橋，謂日寇攻勢已成強弩之末，土坑口之便衣隊爲烏合之漢奸組合，一驅即散，各路來犯之日寇，吾軍能奮力阻擊，必可轉敗爲勝，張李等聽到戴雨農這番讜論，認言之爲有理，立嚴令前方軍隊奮力阻擊，並驅散土坑口之便衣隊，而曲江大橋未經破壞，軍事終獲勝利。

這兩件事，挽救了浙粵二省人民的有形無形的損失，難以估計。戴先生在世時未經宣揚，知者不多。現在事隔三十多年，當時參預其事的，如趙龍文，毛人鳳等，都已作古，故爲寫出，略表戴先生所做的工作究竟是什麼。